

明代江南五府地區 藏書家的書畫收藏風尚

陳冠至
中國文化大學
史學研究所博士

提 要

明代江南的常州、松江、湖州、嘉興與杭州等五府地區的藏書家，有一個值得注意的風尚，就是除了收藏典籍以外，也喜歡收藏書畫，而這個特性使得今人在研究明代私人藏書時產生了一些困擾，也就是說，明代江南五府地區的藏書家，本身也很可能是書畫收藏家，兩者在定義上非常容易混淆。姑且不論明人對於「書籍」的定義與認知為何，若僅以此間藏書家喜歡收藏書畫的風尚來看，要將藏書家與書畫收藏家兩者界分清楚，是一件極不可能的事。

本文針對明代江南五府地區的藏書家喜好收藏書畫的風氣，將這個問題呈顯出來。藉由探究藏書家喜好收藏書畫的原因，乃至書畫收藏在藏書家之間的風靡情況，希望有助將來對於藏書家的定義，能夠提供一個新的方向與參考。

關鍵詞：明代、江南五府、私人藏書、藏書家、書畫收藏

一、前言

綜觀中國的私家藏書史，可以發現自古以來為數甚多的藏書家都有收藏各種不同文獻載體的習慣，這與中國文獻載體的發展以及崇古風尚的流行有很大的關係。在文獻載體方面，從古代的甲骨鐘鼎、彝器碑刻、竹簡縑帛等早期的書寫材料，一直到紙的發明以及普遍利用、印刷術的精進發展，各個時期不同的文化載體，都是當時的文獻主流。但是隨著時間與人類科技文明的進化，年代久遠的文獻載體變成了古董，但絕不能因此而抹煞了它在人類文明進化史上曾經扮演的主流文獻地位。此外，在文化思想方面，中國古代社會充斥著崇古精神與思想，處處以古人為法，事事效仿古人，加上古代教育體制與社會習俗的鼓舞，古董也就成為人們喜愛收藏的對象之一。由於以上兩個原因的交互影響，使得中國的藏書家在收藏古代典籍的同時，許多人在收藏的內容上便包含了法書名畫、鼎彝器物、碑刻縑素等不同性質的古董文物，且因此造成「藏書」這一名詞的內涵，在中國歷史上隨著文獻載體的演化，在收藏內容上產生許多不同的面貌，引起今日學界對於「藏書」的定義，出現一些不同的看法。

需要指出的是，古代的藏書家當中固然有些僅限於專門收藏書籍的，但也有不少藏書家除了收藏書籍以外，還兼收一些鼎彝古物、法書名畫，以及其他種類的收藏品，因此，絕不可能將古代的藏書家與其他的收藏家截然分清。¹其實，書畫作品是古代文獻的重要類型之一，早在隋、唐、五代時期，私人藏書家便曾掀起了一股書畫收藏的時尚，而這股熱潮與當時政府秘閣及內庫珍視書畫收藏的態度互為表裡，一時開啓了中古時代私人藏書的新風氣。所以，中國的私人藏書活動，其收藏的文獻一般不會僅侷限於圖書而已，碑拓、字畫、政府文檔、私人信札、籍帳等亦往往成為收藏對象，這種多類型文獻的收藏習慣，其源頭至少可以追溯至隋唐之風氣。²此外，藏書家收藏書畫的風氣又與歷朝文壇之間的崇古風尚關係密切。以下，我們便來探討受到兩次文學復古運動影響極深的明代江南地區，藏書家們在收藏典籍之餘，也喜好兼收書畫的風氣。

明代的收藏者，不論在人數或是藏品豐富的程度遠遠超過元代，特別是在

¹ 沈振輝，〈元明時期的收藏學〉，頁56。

² 王子舟，〈隋唐五代酷嗜書畫的私家藏書風氣〉，頁48。

明代中後期，民間收藏有著極大的發展，其中主要集中於吳、越兩地。³明代自成化年間以後，江南一帶富庶地區的收藏家輩出，收藏風氣日趨熾盛，且愛好收藏的人士涉及各個階層，社會上瀰漫著相當濃厚的收藏風氣，各種收藏活動呈現出豐富而多彩的局面。⁴特別是明末江南地區的中上等人家都喜好收藏法書名畫，而藏書家們更是如此，這種風氣的濃厚超乎今人的想像。我們可由藏書世家如常熟錢氏、泰興季氏、山陰祁氏等家族的藏畫情況，全面認識明清藏書家的收藏活動。⁵由於這方面的資料頗多，本文僅以長江下游的太湖沿岸地區為研究範圍，包含了明代的松江、常州、杭州、嘉興與湖州等五府地區為考察中心，做為探索明代江南地區藏書家喜好收藏書畫之風尚的切入點。

二、藏書家的書畫收藏動機

（一）文士階層的生活品味

近年來，明史學界對於文人生活文化的研究呈顯出越來越熱絡的趨勢。的確，明人的生活方式充滿著各式各樣的趣味，他們在生活上的尚趣精神以及對於審美方式的講究確實讓人印象深刻，並且感到興趣與憧憬。他們在日常生活裡所展現的生活品味，與當時文人的心態絕對有很大的關係。比如說明代為數不少的文人，都是從科場中敗退的失意者，他們在屢遭躓踣的科舉考試以及失意的宦途當中，漸漸感覺到從仕之路形同嚼蠟，不論釋褐與否，不數年便又紛然賦歸以去，甘心於田園的隱居生活。加上明代的官場，習氣素重，派閥鬥爭由來以久。朋黨的傾軋，巨閥的擅權，加上皇帝的昏庸，使得以意氣自負的讀書人感覺到有志難伸。他們目睹敗壞已極的朝綱，若是勇於秉性直言，輕輒受到各種懲罰，或者遭受排擠，重則落得殺身滅門的下場。進士出身者猶不能免，舉人以下各途則更不必論，種種跡象都足以讓他們視官場如畏途。這種現象打從明初即有，而在中期以後則顯得更加突兀，特別是到了晚明時期，文人的隱逸心態可謂達到了高潮。

3 同註1。

4 沈振輝，〈明人的收藏活動〉，頁87。

5 （清）吳其貞，邵彥〈本書說明〉，《書畫記》，不注頁數。

這批灰心於科場與官場的士人，在當代有些人是赫赫有名的博物君子，其中不乏以詩文書畫、器物玩賞、山水攬勝等，作為餘生的生涯規劃。他們在當代不僅載譽一世，同時也是帶動一個時代生活文化的典範人物。⁶如華亭藏書家何良俊（1506-1573），便是一個明顯的例子：

東海何元朗（何良俊）狷潔高雅，自少不與浮俗相能，其所好直欲與賈、董、司馬遷為徒，而賤薄舉子業，雖列為文學高等，其志固不屑也。……乃入太學，訪天下賢士。既卒業，即歸臥家山，多蓄法書名籍，會其神理。樹藝花藥，覽觀榮落之候。得意，即命酒為懽，讀《離騷》、老、莊一二篇，醉即婆娑起舞。每春秋佳日，約所知泛舟峰泖間，尋顧、陸遺踪，輒竟日夕忘返。⁷

嘉興藏書家周履靖（1542-1632），也是如此。「甫弱冠，棄去制舉業，閒窗淨几，闔扉枯坐，始得恣心柔翰，旁及書畫鼎彝諸譜，以至艸木禽魚、天星地術、異域方言，無不涉入。」⁸周履靖在放棄了舉業之後，才轉而得以發展出其充滿個人休閒品味的文人生活方式。據〈螺冠子傳〉載：

遂築「閒雲館」于鴛湖之上，手植梅幾三百本，募經史書畫萬餘卷寔之，諸遊具取朴牢而已，日與賓客倡和為樂。每花時落英入戶，几案皆滿，輒狂吟竟日，故亦號梅癡云。聞瑯琊王元美（王世貞，1526-1590）、吳興茅順甫（茅坤，1512-1601）、四明屠緯真（屠隆，1542-1605）、太原王百穀（王穉登，1535-1612）諸公名，曰：「吾老懶，未獲廁足名公，顧其書吾私艾久矣！」遂挈其所遊稿與相上下，嘯傲山水，數十韻立就，無不怪語咄咄逼人，意得處諸公亦往往虛左揖之也。晚年嗜古益甚。⁹

如同何良俊與周履靖，錢塘藏書家江元祚，也自願放棄了舉子之業，轉而投向收藏典籍書畫的文人休閒生活。他的生活與環境，據曾於崇禎十五年（1642）訪其藏書處「擁書樓」的友人馬元調（？-1645）所言：

6 吳智和，〈明代蘇州社區鄉土生活史舉隅——以文人集團為例〉，東吳大學歷史系編，《方志學與社區鄉土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38。

7 （明）徐獻忠，〈何元朗謁選序〉，《長谷集》，卷六。

8 （明）周履靖，〈螺冠子自敘〉，《梅巖稿選》，卷十九。

9 （明）李日華、鄭琰、劉鳳，〈螺冠子傳〉，《梅墟別錄》，卷下，頁105下—106上。

自「橫山草堂」盤曲而上，即堂爲樓，眉題「擁書」，果睹萬卷，或傳前朝，或頒內府。髹榻再尋，棐几稱是，左史右經，殆將連屋。發爲文章，宜有此構。推窗遠眺，眼界全碧，千峰若圍，隱見樹杪。邦玉（江元祚）因言：「吾年三十八，即高揖博士，不願備弟子員，將盡讀樓中書，以自樂其樂。」略出先世所藏，及生平所購，多余所未見古本。又出一時四方名人高士往來贈答詩篇及文章、圖畫，竟日不能盡。¹⁰

所以，明代文人以居家學藝與休閒品味的生活方式來取代傳統士人的場屋競逐，他們所營造出的是一種脫俗不凡的新人生價值取向，雖然失去了功名利祿等世俗上的實體益處，但所獲得精神層面上的滿足，卻又是多采多姿、趣味滿滿的另一種成就與寄託。

類似這種自願放棄舉業而去追求理想生活境界的文士風格，雖說與古代讀書人「學而優則仕」的作法背道而馳，並且失去了「一舉成名天下知」等出人頭地的大好機會，不過在明代，這樣的行爲，卻普遍獲得了大多數文人與廣大社會群眾的同情與支持，他們稱這些文人爲「高士」或「山人」。特別是到了晚明時期，他們縱橫於朝野之間，對於整個社會的影響力之大，反而高過於那些當官的士人。如華亭藏書家朱大韶（1517-1577），曾經官至南京國子監司業，退隱里居之後，一以藏書以及書畫收藏爲日課，身雖在野，「歲時行圃，召所厚故人從命觴奕，談說鄉里事爲樂，絕不問門外事，四方造請碑志序記，履滿戶外，公投壁以應之有餘力，雖居里巷中，而名稱藉藉，實無異朝省。」¹¹又如華亭藏書家陳繼儒（1558-1639），目睹當時官場的黑暗與無可救藥的明末政局，於是早歲即謝去舉業，以高隱自命。他雖隱居不仕，然高隱聲名卻反而蒸蒸日上，透過當時上流社交圈的口耳相傳，以至後來片言即頗具份量，在文壇與社會上的影響力，有時反而高過一些達官貴人。人稱：

仲醇（陳繼儒）以處士虛聲，傾動朝野。守令之臧否，由夫片言；詩文之佳惡，冀其一顧；市骨董者，如赴畢良史推場；品書畫者，必求張懷瓘估價。肘有兔園之冊，門闥鷺羽之車。¹²

10 （清）丁中，〈江邦玉〉，《武林藏書錄》，卷中，頁53-54。

11 （明）焦竑，王弘，〈南司業朱文石公大韶行狀〉，《國朝獻徵錄》，卷七十四，頁31上一下。

12 （清）陳田，〈庚籤·陳繼儒〉，《明詩紀事》，卷七。

上述何良俊、周履靖、江元祚、朱大韶與陳繼儒等諸人，都是引領一時社會風尚的江南五府地區之藏書家，他們對於自身生活情趣與審美品味的講求，都足以代言整個明代文人生活方式高度發展的極致表現。而從他們身上所看到的晚明時期，是一段思想開放、強調自我與重視本性的活潑時代。當時的學術思潮反道學、反僵化；而在文學創作上則追求自由，獨抒性靈。其時代之黑暗，杌隉不安的政局，使得文士們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只能迂迴應世，紛紛遠離政事，以避禍全身。他們或滯跡園林，著述託意；或寄情書畫，渲染翰墨；或結社酬唱，以文會友；或講究趣韻，閑賞器玩；或習佛參禪，清談靜修。大都是趨向於隱逸、放任與風雅，¹³遂形成了中國歷史上一段特別生動的文人生活文化與風格。

其實，清供、清玩、清賞這類的生活情趣，打從宋代以後就已經開始了。只是到了晚明，清玩、清賞與清供發展成爲一種普遍的風氣，在當時的文人生活觀念當中，已經成爲一種時尚，並且達到了空前未有的情境。簡單地說，所謂清供、清玩和清賞，其本質便是把生活中的每個細節都藝術化，在日常生活中刻意營造或尋找一種古雅的文化氣息或氛圍。可以從山水園林、風花雪月、樓臺館閣，乃至膳食茶酒、文房四寶、草木蟲魚、博弈遊戲、器物珍玩等生活方式上，獲取清玩與清賞的文化精神。人們大可不必車船勞頓，或艱難跋涉去遊山玩水，尋幽訪壑。只要在日常生活當中，在自己的庭院、臺閣、居室、水石、草木、蔬果、門窗階欄、書畫古玩、坐几椅榻、車舟等等，都可以構成一個優美的藝術天地。從某種意義來說，這比著名的風景勝地，與人的關係顯得更爲密切，更爲平和，也更爲溫馨，是人們無時無刻都離不開的生活環境。這的確反映出一種新的生活美學意識。¹⁴這些風雅之士對於各類閒賞生活的憧憬，不但努力追求與刻意營造，甚至定有日課，以爲風雅生活的依據。杭州藏書家馮夢禎（1548-1605）居家有常課，其記云：

家常五事：教子、弄孫、對老婦；宴語；娛小姬；有客對客；飲時隨宜，不粗不侈。除此五事，則居書室。書室十三事：隨意散帙；焚香淪茗；品泉；鳴琴；揮麈習靜；臨摹法書；觀圖畫；弄筆墨；看池中魚戲；或聽鳥聲；關卉木；識奇字；玩文石。數日一行者四事：登眺山

¹³ 黃桂蘭，〈晚明文士風尚〉，頁140。

¹⁴ 吳承學等，〈晚明心態與晚明習氣〉，頁67-68。

水；尋僧；訪知舊；有花時看花。起居外，每經月必行者一事：范村虎跑展墓。經時或半歲必行者四事：祀先拙園；了故鄉諸緣；省墳墓；隨宜收買奇書或法書、名畫。五十前必勾當者三事：遊天台、鴈蕩諸名山；置湖莊；定山中隱居所。¹⁵

明人品味的另一個表現是人們對於生活上周遭的任何事物都充滿了濃厚的興趣，這可以從兩方面看出來：一是對於野史趣聞的收集範圍之廣，內容之豐富怪誕；二是收藏品的種類日益增多，雅俗兼具。¹⁶在明人普遍喜好的收藏世界當中，集藏品的內容主要有書畫、圖書、銅器、玉器、香料、奇石、金銀珠寶等物品，並且涉及諸多行業。¹⁷而在明代私家收藏風氣如此熾盛的情況之下，收藏者涵蓋了各種社會階級，包括王公貴族、大臣官吏、士紳名流、富商大賈，以及精於鑑賞的書畫家，還有一些宦官等。其間大多善於鑑賞，但也不乏一些附庸風雅的好事者。¹⁸例如：

宜興吳尚書儼（1457-1519），家巨富，至尚書益甚。其子滄州，酷好書畫，購藏名筆頗多。一友家有宋宮所藏〈唐人十八學士袖軸〉一卷，每欲得之，其家非千金不售。吳之弟富亦匹兄，惟粟帛是積，清士常鄙之。其弟一日語畫主曰：「〈十八學士〉果欲千金耶？」主曰：「然！」遂如數易之。而後置酒宴兄與其素鄙己者，酒半，故意談畫，眾復嗤焉，然後出所易以玩。其兄驚且嘆曰：「今日方可與素之鄙俗扯平。」吳下至今傳為笑柄。¹⁹

儼仕至南京禮部尚書，不但道德文章名滿天下，且家貲鉅萬，富甲一方。其家人雖好收藏，卻庸俗不堪，即便名為好事，實則好貨財而已。諸如此類笑話，頗能將明代社會大眾視書畫收藏為一種極度高雅的休閒文化之情形呈顯出來，收藏書畫在當時的確具有擺脫俗態的功用；同時，附庸風雅的習氣也是當時的時代特徵之一。

明人對於典籍與書畫、彝鼎、器物的收藏與鑑賞之所以會如此風行，歸根究

15 （明）馮夢禎，〈真實齋常課記〉，《快雪堂集》，卷四十五。

16 羅筠筠，〈明人審美風尚概觀〉，頁177。

17 沈振輝，〈明代藏品市場略論〉，頁83。

18 單國強，〈明代書畫鑒藏概說〉，頁37。

19 （明）郎瑛，〈十八學士卷〉，《七脩類稿》，卷四十四，頁536。

底，應該與當時的時代和社會背景的蘊蓄發展，以及前兩次的文學復古運動，²⁰有相當密切的關係。由於明代經濟的發達、社會的富庶與政治的黑暗，加上自宋代以來文士對收藏活動的提倡，以及明代文人本身「崇古」、「好隱」、「尚博」、「好事」等風格的影響，基於各方面條件的成熟與催化，便使得收藏與鑑賞活動在當時大為流行。在探究他們對於這些活動的熱衷之前，必須先瞭解明代文人所具備的一些性格特徵。

首先，明人對於古人的「博雅」風格印象相當深刻，並且充斥著孺慕之情，認為「古人所以愛博洽之士，重山澤之客者，為其能封己以謝俗，明古以證今也。」²¹也就是說，明人崇尚古人的博洽，認為由此可以進入他們所追求的「高雅」境界。而「雅」則不俗，是中國古代重要的審美範疇之一，用以品評人物風度或鑑賞作品風格，成為一種藝術審美理想和文學批評標準。²²所以，「崇古」與「尚博」便是達到「博雅」的主要途徑。特別是「尚博」精神，明代文人也非常注重，認為「學不可以不博，博而雅焉，斯為可尚。」²³可見「博雅」的觀念主導著明代文人的精神追求，進而影響到他們在生活上的一切表現。為了能夠博學，文人們對周遭的一切事物都很感興趣，進而展現出一股「好事」的風格，加上社會經濟的充裕富庶、文人因政治的黑暗而對從仕興味索然，使得文士們有足夠的時間與財力「好事」，這也是進入「博雅」境界的一種有利條件。所以，在以上種種因素的交互影響之下，皆以「博雅」為前提，明代文人在生活文化上表現出諸多的癖好與審美情懷。

次論「好古」。其實，江南地區的「好古」之風自古已然，早在南唐時期便已開始。明代嘉興藏書家包檉芳（1534-1596）提及：「南唐好古號為吳癡，而宣和之藏悉輦而南，故江左收藏、好事兩家，迄今不絕。」²⁴只是在元末明初，「好古」的風氣一度衰退，不為社會所崇尚；而時人也認為「好古」的真諦並非表現在人的嗜癖上面，反而必須有所節制，用於聖賢之道，才是「好古」的真正

20 有關明代的文學復古運動，坊間論著頗多，今舉其一，可參見廖可斌，《明代文學復古運動研究》。

21 （明）周履靖，張獻翼〈夷門廣牘序〉，《明刊本夷門廣牘》，卷一，頁17上。

22 孫克強，〈論「雅」〉，頁87。

23 （明）丘濬，〈博雅軒記〉，《瓊臺詩文會稿》，卷十八。

24 （明）陸樹聲，包檉芳〈陸學士題跋序〉，《陸學士題跋》，書前，頁2上。

意義。楊維禎（1296-1370）曾論好古：

古之不諧於今者久矣！孰以古爲好耶？三代下嗜好百出，好酒而鍾以隨，好傳墓而牧以亡，好勇而舉鼎以說臚，好獵而隊車以隕首，好游而賈害以利，好談諧而售辱以戲，好書而污髮以爲顛，好畫而竊封以爲神，好鍛而倨以取禍，好石而拜以取喪，好鶴而乘軒以取滅國，所好不同，而所失亦隨以異。惟好古爲聖賢之學，愈好愈高，而入於聖人之域。而凡世之所好者不一，足以動其志，此好古効也。今之人不古好，覆以好古爲野謔駭無任，悞淫不道，逮至毀綱裂常，自謂行於今者橫如也，不知步跲者在戶限外。吁！亦足省矣！²⁵

然而楊維禎的這種說法維持不久，稍後的明初江陰藏書家孫作（？-1375）便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認爲各種有關「好古」的各種癖好，只要不涉及金錢貨利，便都是崇尚古人的表現，當然也都是值得提倡的。他說：

士之好古雖近於癖，然不失爲君子，若小人則富有是哉？始吾鄉之士有以三千緡易一古罍者，或笑之曰：「吾有三千緡，易一銀甕矣！」士曰：「吾與子二銀甕，而取一罍有諸？」笑者不能答。二人之言皆有理，而好貨之言，正爲小人。嗟夫！以一言而君子、小人於是乎辨。若是，則士之好惡，可不謹哉！²⁶

到了中晚明，文士們對於「好古」精神的發揚已經完全地融入了日常生活當中，並且達到了高潮。晚明的文人普遍寓有濃厚的古典情懷，舉凡鐘鼎彝彝、書畫法帖、窯玉古玩、文房器具等物，都是他們閒賞生活當中極爲重要的一環。這些古物，不僅是做爲賞心悅目的憑藉而已，它們還進一步地被用來裝飾文人的生活。而在文人的起居生活當中，有了這些古物的存在，更能夠喚起文化與歷史的悠遠感情，並且與俗世現實的生活巧妙地隔離，進而拉開一段美感的距離。²⁷

至於收藏典籍書畫、古器物彝鼎等活動，到了明代中期以後，也已經頗能符合文人們所崇尚的「好古」與「尚博」精神，一躍而成爲文士們「博雅」的外在表現。以藏書而言，「至薦紳博雅，勝士韻流，好古之稱，藉藉海內，其藏蓄當

²⁵ （元）楊維禎，〈好古齋記〉，《東維子集》，卷十五。

²⁶ （明）孫作，〈錢譜序〉，《滄螺集》，卷六。

²⁷ 毛文芳，〈花、美女、癖人與遊舫——晚明文人之美感境界與美感經營〉，頁414。

甲諸方矣！」²⁸可見在明代欲得「博雅」與「好古」的聲名，藉由典籍的廣肆收藏，便可羅致。這個觀點在明代江南五府地區也廣泛地為藏書家們所普遍接受，甚至推展到書畫碑刻的收藏上面。如上海藏書家董宜陽（1510-1572），也因喜好收藏典籍與法書、古今石刻等文獻，而獲其鄉人的敬重，稱其為：「吾郡之博雅君子也。」²⁹而華亭藏書家陳繼儒也認為收藏書畫，是一種「崇古」的表現，他說：

經史子集以辭相傳，而碑刻則并古人手蹟以存。故好古尚友之士，相與共訪而傳之。³⁰

他不但認為藏書是一種「好古」的表現，並且指出收藏書畫與碑刻也都是「崇古」的作風，必須加以提倡。他認為：「嗜古者見古人書畫如見家譜，豈容更落他人手；見古人壙墓碑版如見先壠間物，豈容更落樵採不思呵護耶？」³¹又如無錫藏書家華理（1438-1514），也因喜好收藏典籍與法書名畫，為時人所稱云：

華尚古名理，字汝德，嘗仕，有官稱，以其仕不久，又性好古，故遺其官不稱，稱尚古生。³²

足見收藏典籍與法書名畫，在明代江南五府地區為藏書家們普遍視為一種尚古精神的表現；而好古者在社會上的形象與地位更高於官職，因此更是為文士們所崇尚的休閒生活方式之一。

而藏書與收藏書畫的文人休閒生活方式，到了明代中後期也表現得最為淋漓盡致，成為多數江南五府地區藏書家所兼有的一種生活文化，並且融入於當時文人間崇尚的閒賞生活當中。華亭藏書家何良俊曾經自述其生活型態：

家畜周秦彝鼎數種，法書數籤，古今名畫百餘軸。屋後有佳木千章，好鳥千群，既力任負鋤，每親灌治。又不忤之心乎於異類，故樹既敷榮，鳥亦馴狎。每晨起盥櫛了當，輒散帙讀道書一二卷，自淪鼎煮陽羨鬪品，連啜三四甌。有時撫弄彝鼎，展玩卷冊。勸則暫起行散林中，既而群鳥畢集，相和數百許語，雖不能如昔人就掌取食，亦庶幾入群不亂行

28 (明)胡應麟，〈甲部·經籍會通四〉，《少室山房筆叢》，卷四，頁56。

29 (明)何三畏，〈董太學紫岡先生傳〉，《雲間志略》，卷十九。

30 (明)陳繼儒，〈岩棲幽事〉。

31 (明)陳繼儒，〈妮古錄〉，卷三。

32 (明)文徵明，〈華尚古小傳〉，《甫田集》，卷二十七。

矣。逡巡如此，便了一日，自以為有生之樂，過此不復有須。倘有方外之賓，略區中之事，便當披襟散髮，把臂入林，形跡既忘，主賓俱暢。

苟或責其苛禮，猶復剔剔不休，則豈但於諸君鮮懽，亦乃違余本性。³³

特別是這些兼收書畫的藏書家們在對書畫進行鑑賞的過程當中，他們同時也產生了一種出世和隱逸的思想。書畫鑑賞使得當時的文人在入世享盡繁華的同時，又能求得一道清逸脫俗境界的出世良方，此又與他們的「好隱」精神不謀而合。而文人以書畫古玩為媒介，也達成了在世俗與清雅間生活的現實願望。明代文人「崇古」、「好隱」、「尚博」、「好事」等「博雅」風格，到了明末的江南五府地區已經發展到了極致，可以嘉興藏書家李日華（1565-1635）為代表典型。據《浙江通志》所載：

李日華，字君實，嘉興人。萬曆壬辰（二十年，1592）進士，除九江推官，累官太僕寺少卿，告歸。日華和易安雅，恬於仕進，後先家食二十餘年。能書畫，善賞鑒，一時士大夫風流儒雅，好古博物，祥符王惟儉、雲間董其昌（1555-1636）為最。日華書畫亞於其昌，博雅亞於惟儉，而微兼二公之長，落落穆穆，韻度頹然，可稱名士。³⁴

李日華兼備了明代文人「崇古」、「好隱」、「尚博」、「好事」等「博雅」風格，且因其「能書畫、善賞鑒」而獲得「風流儒雅」與「好古博物」的美名。總之，收藏典籍與法書名畫，在明代江南五府地區確實是社會與文壇上所公認的一種「博雅」的外在體現。而鑑賞書畫是一個豐富的審美過程，明人將觀畫讀帖、焚香鼓琴、栽花種樹、收藏古董珍玩等雅事統稱為「清娛」、「清玩」、「清賞」及「清歡」等，³⁵並且將這些各式各樣的審美觀念表現於收藏生活之上，處處展現出一股特別幽雅的文士品味，普遍受到當時江南五府地區的文人與藏書家的認同。

（二）家族因素的影響

中國古代的私人藏書事業，往往是父業子承，世代相傳的，因此，許多藏書家不但在典籍的收藏上，甚至是法書名畫或者其他的文物，都是上承父祖之遺

³³ （明）何良俊，〈書屏示客〉，《何翰林集》，卷十六。

³⁴ （清）李衛等，〈浙江通志·文苑二〉，卷一百七十九，頁3116-3117。

³⁵ 金炫廷，〈明人的鑑賞生活——江南文人的鑑賞活動與鑑賞自娛〉，頁46。

志，並以不敗其收藏家風爲畢生志向，而善加守藏的。所以，家族因素的影響，自然也是收藏家從事收藏活動的主要動機之一。

明代江南五府地區的藏書家，以家族因素做爲影響藏書家收藏書畫的動機者，當然也是不乏其例。如江陰藏書家李如一（1557-1630）的玄孫李成之曾說：

嗚呼！其積之也窮一生之力，歷數傳之久，祖孫相繼而不足；其散也則委之泥沙，鬻之坊市，或歸他人之几案。……夫子孫不能讀祖父之書，甚至祖父所續述者亦一朝而散失，其何顏以立於世耶？³⁶

的確，在中國古代的私家藏書文化當中，善守先世所藏而不致散佚，是做爲收藏家後代終身的主要職責之一，並常被用來評判子孫是否爲孝子賢孫的主要標準之一。

此外，因受先世影響而從事典籍與書畫收藏活動者，在明代的江南五府地區尚有諸人，如江陰藏書家孫作、華亭藏書家邵文博、上海藏書家董宜陽、秀水藏書家沈啓原（1526-1591）、沈自邠（1554-1589）、沈鳳、沈大詹……等人，凡此諸家，將於後文再做敘述。

不過，明人往往將書畫的收藏與古人所謂的「玩物喪志」聯想在一起，使得明代藏書家在兼收書畫的同時，產生一些猶豫與矛盾。雖說「藏書」與「書畫收藏」在明代極難將其劃分清楚，但是明人通常認爲「藏書」比較傾向於正統的學術之道，與「書畫收藏」比較起來，顯得缺少了那股「耽於逸樂」的意味。關於書與畫之論，明代浙江鄞縣名宦楊守陳（1425-1489）曾經提出「書重於畫」的主張。他指出：

畫與書類也，至論其重輕，則相去遠矣！自雲霞、山水、人物、鳥獸、草木、宮室、服器之倫幽至於鬼神，微至於虫蟻，畫與書皆載之，固相類者。然畫之所載者，其形與色也；書之所載者，其理與事也。其形與色，雖微畫載，人無不識之；其理與事，使非書載，則人不能知之，故世可以無畫，不可以無書。觀畫則或玩物以喪志，觀書則可取善以成德，故書之極重於畫可知矣！然人多喜觀畫，而不喜觀書者，蓋畫則智

36 （明）李詡，李成之〈李成之重刻漫筆跋〉，《戒庵老人漫筆》，卷尾，頁357-358。

愚賢否，皆能觀之，書非賢智，不能觀也。畫惟暫觀可以娛目，書非常觀不足以悅心也。使常觀書，則書固有高深而可羨者。……雖常觀書而不甚喜，蓋未知書之所載者，有過於畫之可喜可觀也。³⁷

此外，山陰藏書家祁承燦（1563-1628）也認為典籍重於書畫，他曾經針對此論加以解釋：

人非大豪傑，安能澹無嗜好？倘嗜好一著于博飲狹邪、馳馬試劍，傷生敗業，固不必言。即染翰臨池，鼎彝金石，非不稱清事，然右軍（王羲之）竟以書概其品，而閤立本且悔恨流汗，戒子孫勿復工繪事。至於玩古之癖，令人憔悴欲死，又不足言矣！惟此種種嗜好，注于嗜書。……惟姑以此書日置几席間，視同玩器，裝潢校讐，朝斯夕斯，隨意所喜閱其一端，一端偶會，此卷自不忍不竟；一卷既洽，眾卷復然。此書未了，恨不能復及一書；方讀其已見，恨不能讀其所未見。自然飲食寢處，口所囁嚅，目所營注，無非是者，……非此不復知人生之樂矣！³⁸

楊、祁二人對於藏書重於藏畫的理由說得相當精闢，誠為明代中後期江南地區藏書界普遍兼收書畫的一股反動勢力。而在當時五府地區的藏書界當中，一些藏書家也與楊、祁二人的見解相為呼應，他們多半認為藏書足以助學，而書畫收藏則易使人玩物喪志；藏書可傳子孫，而書畫收藏或將以引子孫進入貨利之競逐。如上海藏書家陸深曾經呼籲藏書家從事藏書事業切忌玩物喪志，以免落得破產敗家的悲慘命運。他說：

蘇丑，字叔武，歙人。易簡之後，年八十餘，正統間卒。以隱逸自高，性愛古法書名畫，不惜萬金購之，曰：「此足養心性，非他玩好可比。」其人品亦可謂博雅矣！近時江南人家有好古玩物至於敗家亡身者，此又可為監戒也。³⁹

又如無錫藏書家秦柱（1536-1585），「生平好惟古金石圖書、秦碑漢碣，積至充棟，酬價皆不貲。所緝國朝大臣傳志，幾數千卷。秘書奇策，購得輒加繕寫，侍史常數十人。君故公卿子，產頗饒厚，及君之歿，有責累千，貧不能具殮，延蒸

37 （明）楊守陳，〈閒中清玩序〉，《楊文懿公文集》，卷一。

38 （明）祁承燦，〈藏書訓略·購書〉，《澹生堂藏書約》，頁18下—19上。

39 （明）陸深，〈玉堂漫筆摘抄〉，卷一百三十一。

（秦柱之子）至盡鬻其遺書謀葬。」⁴⁰的確，不論典籍或是書畫鼎彝等其他文物，從事收藏活動本來就需要一定程度上經濟條件的支持。秦柱之所以敗家，乃在於偏好收藏「古董」，不但對於書畫碑帖如此，甚至在典籍的購求上，也講究奇秘古刻。這樣的花費，較之一般的藏書活動所需的費用高出千百萬倍；加上他大量倩人抄寫，如此一來，偌大家產怎不為之耗盡？

但是，若仔細的將書畫器物與典籍在收藏上的費用加以比較，收藏典籍在資金方面，藏書家顯得比較易於管制。因為一般的藏書家之於典籍的收藏，往往著重在內容的取得，對於那些價高的宋版書或奇書祕本，他們可以透過抄錄而獲得，即使沒有得到原本，亦可透過閱讀其內容而獲得滿足。如萬曆時的錢塘藏書家虞淳熙（？-1621），家貧，「力不能購異書，與弟閉門鈔書，晝夜不止，有武庫行祕書之目。」⁴¹而反觀書畫則不然，收藏者縱然能夠透過借閱取得，若本身沒有具備十足的臨摹功力加以複製，即使倩人代筆，仍為贗品，這在收藏者與世人的心中，都會產生一些負面的感覺與想像，無法如同書籍一般地得到安慰與滿足。所以，在收藏方面，昂貴的書籍若無力購買，尚可以抄錄而取得；至於書畫，則非購藏原本無以滿足收藏者的收藏欲望。以是其所花費，必將不貲，而收藏者若不知加以節制，非常容易敗產破家，甚至因而自取滅亡。

同時，抱持「玩物喪志」這類觀點的藏書家也認為，藏書以遺子孫，誠可興其家學；但若以書畫傳家，適足危害後世，其禍且不可測，此為國有家者，不可不慎。先就收藏書畫而論，仁和藏書家郎瑛（1487-1566），便抱持著如此的觀點，他指出：

書畫古玩，自有國而言，至宋徽宗之世，可謂極備，觀其書譜、畫譜、博古、考古圖可知矣！惜乎胡騎一入，零落漫毀，百不存一；自家而言，一聚此物者，必然敗去！豈非物之美者，人心所在，鬼神臨之，大有大異，小有小異，不可聚此以為子孫可常守也。⁴²

郎瑛認為書畫聚於一國、一家或一人之手，還盼望能夠從此傳之後世而無虞，這種想法弊害頗鉅。郎瑛的這個說法，其實並不難理解。首先，為了收藏，花費與

40 （明）趙用賢，〈中書舍人秦君汝立墓表〉，《松石齋集》，卷十二。

41 （清）丁中，〈虞長孺僧孺兩先生〉，《武林藏書錄》，卷中，頁49。

42 （明）郎瑛，〈奇物不可守〉，《七脩類稿》，卷十八，頁212。

開銷將會很大，因此，必定窮國敗家。而一旦沉溺於此，又將無心於國事與家事，也會導致喪亂。此外，書畫大量聚於一處，若逢災厄，恐將損燬殆盡，反成破壞文化的千古罪人。因此，郎瑛將書畫喻之為神鬼妖物，收藏者容易枉道速禍。

上海陸深以藏書充棟知名於時，並且兼收大量的書畫，然他也曾經慮及此害，而告誡他的子孫們說：

大抵法書名畫，所貴收藏，苟存憲古藝游之意，其於檢心畜德未為無助；彼徒以文具玩物，則喪心之戒攸在，吾子孫其念之。《宣和書畫譜》皆出蔡京之手，其識鑒自繫人品，已難盡據。⁴³

陸深所憂於子孫者，簡而言之，乃在於深恐子孫們將視書畫為玩物而不知其尚古蓄德之意。或持以變賣換錢，唯利是圖，而不思先祖積聚之不易；或巧取豪奪，傷天害理，而不知書畫所以怡情養性，修身導善之用途。持以賣錢者，易盡則產隨之破；巧取豪奪者，以身涉法，甚者殺身滅門。凡此皆為陸深所懼，於是他又告誡世人曰：「夫法書名畫，果入神妙，猶為無益於世。而巧偷豪奪，胎禍以累德者不少，君子之所為殷鑒也。」⁴⁴

華亭藏書家陳繼儒，也喜好收藏書畫，且與陸深頗有同感，他曾感慨地說：「夫癖於古者，發肱篋，椎冢墓，帝王而巧賺僧藏，文士而僥奪人好，及其究也，至化為飄風冷煙而不可得。」⁴⁵此外，僑寓杭州的藏書家張岱（1597-1689），其家典籍與書畫的收藏都滿屋連架，也認為收藏書畫無益於後人，他說：

余謂博洽好古，猶是文人韻事，風雅之列，不黜曹瞞（曹操），鑒賞之家，尚存秋壑（賈似道）。詩文書畫未嘗不抬舉古人，恆恐子孫效尤，以袖攫石、攫金銀以賺田宅，豪奪巧取，未免有累盛德。⁴⁶

正由於這些「玩物喪志」與「遺禍子孫」的想法，使得有些江南五府地區之藏書家視收藏書畫為畏途，轉而一心一意地僅以書籍為收藏內容，絕不涉及書畫，尤

43 （明）陸深，〈跋李昇出峽圖〉，《陸文裕公行遠集》，卷十二。

44 （明）陸深，〈跋家藏韓幹畫馬〉，《儼山集·續集》，卷八十九。

45 （明）陳繼儒，〈妮古錄序〉，《妮古錄》，書前，頁1上。

46 （明）張岱，〈朱氏收藏〉，《陶庵夢憶》，卷六，頁102。

其是繪畫，更是如此。例如無錫藏書家周子義（1529-1586），秉「性澹薄，生平無鼎彝圖畫珍奇之好，顧獨嗜書，書積萬餘卷，多公手蹟。」⁴⁷ 歸安藏書家姚翼，也對收藏圖畫興味索然。他說：

天下之物，莫難於聚；而其聚也，莫貴於不散。余嘗觀世之貴游公子，往往馳心於金玉、珠璣、珊瑚、翡翠之好，而竭其力以致之。間或厭苦世俗而稍務為清虛者，則或奇花、怪石或古器、圖畫，終其身淋漓燕嬉於其中而不出。……余自少無他好，不惟於世俗之所沈酣如金玉、珠璣之類略不以淄乎其心，雖花石、畫品為清虛之士所崇尚者，亦所欲不存。而其私心之所癖而不舍者，乃獨在古今之簡策。⁴⁸

雖說如此，類似周子義與姚翼等只收典籍而不藏繪畫的藏書家，在明代江南五府地區的確相當少見，只能說是少數的個案，而更多的卻是書籍與法書名畫、鼎彝器物等各種文物兼收的藏書家兼收藏家，此將於下文中就所蒐集到的資料一一舉證。這些收藏內容廣博的藏書家，對於收藏書畫、鼎彝等文物為玩物喪志的說法，提出客觀的糾正說法，認為：

「玩物喪志」一語，出偽《古文尚書》〈旅獒〉篇，其云：「玩人喪德，玩物喪志。」物對人言，蓋指犬馬之類也。自後人誤以書畫古器目為玩物，而或者遂執此語以相禁戒，不知伏羲畫卦，書之始也；帝舜十二章，畫之始也，二者正吾儒所宜究心。故古之小學，即是學書，而繪事亦見於聖言，在所不廢。至若從古流傳玉、銅諸器，多詩、書、禮諸經所載，必藉此得以考古人制器尚象之意，尤不可為學問以外事也。此與才人文士，風流鑒賞者又迥別，若夫富貴貪婪，目不知書，而亦事此，此直好貨耳，更不足論焉。⁴⁹

他們排除上述各種反對兼藏書畫的說法，指出繪畫的文化與歷史功用其實不下典籍。如嘉興藏書家李日華認為：「古者圖、書並重，圖以存典故，備法戒，非浪作者。」⁵⁰ 這類藏書家大力鼓吹藏書兼藏書畫的好處，除相互嘉勉之外，並設法影響其他藏書家以鼓舞風氣。如秀水藏書家項元汴曾敘述嘉興藏書家周履靖的藏

47 （明）張萱，〈著述·周子義〉，《西園聞見錄》，卷八。

48 （明）姚翼，〈玩畫齋藏書目錄序〉，《玩畫齋雜著編》，卷二。

49 （清）姚際恆，〈好古堂家藏書畫記〉，卷上，頁1。

50 （明）李日華，〈畫說與戴樞賓〉，《恬致堂集》，卷三十九，頁8下。

畫癖好云：「余嗜畫成癖，家頗蓄一二名手，梅顛（周履靖）之癖似余，更欲以其癖而染之來人。」⁵¹ 所以，藏書兼藏書畫的風氣便在明代江南五府地區開花結果，並蔚成當地藏書界所崇尚的一種收藏風格。

（三）藏書家本身的癖好

誠如前文所述，明代文人在時代背景、社會經濟條件、政治環境以及復古運動的交互影響之下，具有「崇古」、「好隱」、「尚博」、「好事」等「博雅」風格，表現在日常生活上，便產生了諸多的癖好。明代文人對於癖好相當推崇，不論是何種癖好，只要不露俗態，都有其特有的審美情懷與價值觀，也分別都受到人們的重視。時人認為：「古人有篤嗜者必有深癖，有深癖者必有至性。」⁵² 甚至「人無癖不可與交，以其無深情也；人無癖不可與交，以其無真氣也。」⁵³ 這種現象在明代江南五府地區也非常普遍，許多文人本身都兼具了數種嗜好。而藏書家也是如此，例如嘉興藏書家周履靖便身兼多種癖嗜，他「有梅癖，有傳癖，有山水癖，有書畫癖，又有金石癖，癖何多也。雖然，不寧愈于馬癖、錢癖者乎！」⁵⁴ 由於馬癖、錢癖等比較偏向財貨方面，無益於明代文人對「博雅」的追求，便顯得俗氣，所以被文人們視為末流。如此一來，明代文人在現實生活當中，雖說有各種癖好可供消閒，不過他們對於當時的眾多癖好仍是有選擇性的，而他們的選擇，總是不離以滿足本身對於「博雅」境界的追求，以及符合當時世俗對於文人高逸與博學形象的期望為主，即使身兼數種癖好，也是如此。

這種觀念在江南五府地區，對於藏書家們而言，亦有此尚。他們往往對於有關貨利與嬉戲玩樂等方面的癖好一無所顧，僅以有助於追求文雅與博學的癖好為主，因此，收藏典籍與法書名畫、鼎彝碑刻等活動成為他們的最愛。如無錫藏書家邵寶（1460-1527），據《皇明書列傳》載：

性度端雅，貞介夙成，未嘗有疾言遽色。自始仕至老家居，餽遺例不苟授。室無長物，惟金石遺文嗜弗懈。尤惇古學行。……於聲色……貨

51 （明）汪顯節，〈項太學元汴〉，《繪林題識》。

52 （清）李桓，〈顧謙〉，《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百七十三。

53 （明）張岱，〈祁止祥癖〉，《陶庵夢憶》，卷四，頁72。

54 （明）汪顯節，〈孫漢陽克弘〉，《繪林題識》，頁55上。

利、嬉戲事，概不涉心。⁵⁵

邵寶一意藏書，兼收金石碑刻，而絕口不言財貨利祿之事，對於無益「博雅」之事，更是興味索然。又如上海藏書家陸深（1477-1544），也是如此。除了喜好藏書之外，他於「聲色、貨利無所嬰情，唯法書名畫、商彝周鼎，則時供鑒賞，用為博古之助。」⁵⁶ 書畫鼎彝可供博古與鑑賞，對於文人們的博學形象大有助益，特別是喜好探求知識以廣其學問的藏書家們，兼收書畫的好處如同藏書，自然為藏書家們所重視。而陸深於癖好之選擇，正可謂為江南五府地區藏書家喜好兼收書畫者之典型，因其有助「博雅」，所以成為陸深於藏書之外最為崇尚的休閒活動。還有無錫藏書家華夏（1490-1563），其「家本溫厚，菑畚所入，足以裕欲。而君於聲色服用，一不留意，而惟圖史之癖。」⁵⁷ 上海藏書家董宜陽，「平生嗜好，惟書與古今石刻為最。」⁵⁸ 諸如此輩，都不為當代所充斥著多采多姿的癖好所炫惑，而一以藏書與收藏書畫為嗜。他們之所以如此，便是出於自身對於「博雅」的追求，使得藏書與書畫的收藏凌駕於諸癖之上，成為江南五府地區藏書家們主要的休閒生活。

此外，明代還有個值得注意的現象，在許多著名的藝術家當中，還有不少人酷愛藏書事業。在當時這樣濃郁的文化氛圍裡，藏書與書畫古器收藏成為一時風尚，是明代藏書的一大特色。⁵⁹ 明代很多藏書家本身即為藝術家，除了喜好藏書以外，因為本身所從事的書畫藝文活動的需要，也兼收書畫。這樣的例子從明初到明末於江南五府地區都不乏其人，如無錫藏書家倪瓚（1301-1374）：

家雄於貲，工詩，善書畫，四方名士日至其門。所居有閣曰：「清閬」，幽迥絕塵。藏書數千卷，皆手自勘定。古鼎法書，名琴奇畫，陳列左右。⁶⁰

上海藏書家陸深除喜好藏書外，也工書法。他於藝術與學問方面頗有所好，「發為文章，成一家言。作詩直寫性情，得風人之旨。書法妙逼鍾王，比於趙松雪，

55 （明）鄧元錫，〈邵寶〉，《皇明書列傳》，卷二十五。

56 （明）唐錦，〈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學士嚴山陸公行狀〉，《龍江集》，卷十二。

57 （明）郁逢慶，〈真賞齋銘〉，《書畫題跋記》，卷五。

58 （明）朱察卿，〈董子元先生行狀〉，《朱邦憲集》，卷十。

59 傅璇琮等，《中國藏書通史》，頁668-669。

60 （清）張廷玉等，《新校本明史·隱逸列傳·倪瓚》，卷二百九十八，頁7624。

而遒勁過之。」⁶¹同縣的藏書家董宜陽，也「工詩文，兼善古人書法。」⁶²而明代中後期於文壇與藝林最享盛名的秀水藏書家項元汴（1525-1590），手執文學、藝術、藏書、收藏、鑑賞等不同領域的牛耳，為一時膾炙人口的風雲人物。「初為國子生，雅擅賞鑒，收藏名蹟甲于江左」，⁶³而本身「尤精繪事。」⁶⁴「蓋其留神翰繪，家藏既多，薰習之久，亦能自運。」⁶⁵因此，項元汴可稱為明末江南五府地區藏書家因本身篤好染翰臨池，進而喜歡收藏書畫的典型。（圖1）

到了明末，五府地區身兼知名藝術家與藏書家的文士未曾稍減。武進藏書家江惟清篤好收藏典籍與法書名畫，「終日臨摹不輟，其文筆人咸寶之。」⁶⁶而嘉興藏書家周履靖，更以喜好典籍與法書名畫的收藏享譽蟬林，其「博雅」為時人所津津樂道。他本身於文學、書法與繪畫方面，也頗有成就，據《萬曆·秀水縣志》載：

所著詩盈百卷，手書金石古篆隸、晉魏行楷及畫史稱是，吳郡聞人，莫不欲結衲於居士。……亦一時博雅隱君子云。⁶⁷

此外，華亭藏書家董其昌，更以精通書法與繪畫縱橫於江南五府地區，他「天姿高秀，書畫妙天下。」⁶⁸（圖2）而明末最負盛名的山人陳繼儒，清修博古，著述又富，為一時高士，本身擅長書法之外，亦精於山水畫。他是華亭的著名藏書家與書畫收藏家，認為喜好書法必須藏書。他於「書法蘇長公，故于蘇書，雖斷簡殘碑，必極搜採，手自摹刻之。」⁶⁹

這些精通書法或繪畫等技藝的藏書家，由於本身對藝術的喜好，因此除了藏書以外，對於收藏法書名畫的嗜好也不減藏書。而收藏書畫的主要目的，在於能夠提升藝術方面的造詣與功力，正是因為這個原因，使得他們大量地收藏書畫，

61 （明）夏言，〈通議大夫詹事府事兼翰林院學士贈禮部右侍郎謚文裕陸公墓誌銘〉，《夏桂洲先生文集》，卷十六。

62 （清）王鴻緒等，〈董宜陽〉，《明史稿列傳》，卷一百六十三。

63 （清）徐沁，〈項元汴〉，《明畫錄》，卷四。

64 （明）項元汴，〈本傳略〉，《蕉窗九錄》。

65 （明）姜紹書，〈項元汴〉，《無聲詩史》，卷三。

66 （清）董似穀等，〈光緒·武進陽湖縣志·文學〉，卷二十三。

67 （明）李培等，〈萬曆·秀水縣志·隱逸〉，卷六。

68 （清）錢謙益，〈董尚書其昌〉，《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下，頁636。

69 （明）朱謀壘，〈陳繼儒〉，《續書史會要》。

既為藏書家，又為書畫收藏家。其實，藏書對於喜好書法與繪畫的藝術家有很大的影響力，這種觀念深植於明代江南五府地區一些喜好藝術的藏書家心裡。先以繪畫方面而言，想要於畫法精進者必須藏書。如本身於繪畫頗有心得的嘉興藏書家李日華曾引古語說：「不讀萬卷書，不行萬里路，不堪作畫。」⁷⁰有一次，某位喜好繪畫藝術的朋友於技法上遇到瓶頸，請教於李日華。李日華便告訴他說：

但日讀異書，日行荒江斷岸，或婆婆樹下而稍縱以酒，則手有不謀於心眼而躍然自奮者矣！⁷¹

可見畫筆欲精進，仍須藉由多讀異書，多增長見聞，以是於善繪者，必以多藏秘籍為尚。再以書法方面來說，亦是如此，書法家也必須多多藏書，方能更上一層樓。華亭藏書家陳繼儒也曾引古語而云：「士大夫下筆，使有數萬卷書，氣象便無俗態，不然，一楷書吏耳！」⁷²總之，明代藏書家之所以喜好兼收書畫，最顯而易見的理由至少有兩個：一是古代文物成為書齋必收藏的對象，不僅藏書多宋元版本，亦兼收古法書名畫、器物彝鼎之類的古董，此與文人的追求博雅與好古風尚等自身的癖好有關。二是由於許多藏書家多擅長書畫，書畫已是書齋不可或缺的陳設，⁷³加上本身於技法精進上的需求，他們也必須多方藏書。所以，在明代江南五府地區裡，藏書與書畫收藏的關係，可謂密不可分。

三、藏書家的書畫收藏風尚

（一）洪武至天順時期

明代初期，由於社會與政治上的不安定，加上士人承繼了元末的避世風氣，於是文壇上也時興著一種韜光養晦的生活態度，即文人喜好過著逸隱的休閒方式，而藏書在當時文士的隱居生活上，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元末明初，江南五府地區出現了許多知名而喜好隱居的藏書家，而在他們的藏書生活裡，同時還兼收一些書畫彝鼎，或是其他的古代文物如樂器、刀劍、錢幣、印章……等等。這種情形相當普遍，除了可以打發無聊的山中歲月以外，更可向世人強調自身的

70 (明)李日華，〈項孔彰遊草題辭〉，《恬致堂集》，卷十七，頁28下。

71 (明)李日華，〈題楊龍友畫冊〉，《恬致堂集》，卷三十八，頁18下。

72 (明)陳繼儒，〈妮古錄〉，卷三，頁7下。

73 暴鴻昌，〈明清時代書齋文化散論〉，《齊魯學刊》，1992年2期，頁100。

博學。如無錫藏書家倪瓚，便是如此。他「強學好修，性雅潔，輕財，談言絕人。築清閬閣，藏書萬卷，充彝鼎名琴於左右。」⁷⁴倪瓚在明初的東南地區享有盛名，由於他的父祖輩們善於治生，使其自幼家中便饒富貲財，為日後隱居與消閒之費，提供了先天上的優渥條件。由於經濟的充裕，其「所居有清閬閣、雲林堂，多蓄古書畫奇玩。」⁷⁵而他的生活方式，也的確獨領風騷於一時，尤其表現在收藏活動上面，更是他生活內容的主軸。據其墓志所載：

未嘗為紈綺子弟態，談辯絕人，臺臺不倦，好客之名聞於四方，名傳碩師、方外大老，咸知愛重。所居有閣名清閬，幽迥絕塵。中有書數千卷，悉手所較定，經史、諸子、釋老、岐黃、紀勝之書，盡日成誦；古鼎彝、名琴，陳列左右，松、桂、蘭、竹、香、菊之屬，敷紆繚繞。而其外則喬木修篁，蔚然深秀，故自號雲林。每雨止風收，杖屨自隨，逍遙容與，詠歌以娛，望之者識其為世外人。客至，輒笑語留連竟夕乃已。平生無他好翫，惟嗜蓄古法書名畫，持以售者，歸其直累百金無所靳。⁷⁶

可見倪瓚不但耽於藏書活動，對於鼎彝、名琴等古物，也頗有所好，特別對於書畫的收藏，更是情有獨鍾，甚至不惜捐金以求，他這樣的生活方式，堪稱明初江南五府地區藏書家的博物典型之一，也鼓舞了此時與此地的藏書家們兼收書畫的風氣。（圖3）

江陰藏書家孫作，元末兵亂時攜家避難於吳，他物不及裝卸，獨載書兩簾以行。安頓下來以後，復藏書於「太古軒」，自記曰：「吾室左圖右書，暇則與聖賢相對；汙尊杯飲，則與華胥同適。又有琴焉，撫而弄之，為太古之音，歌南風之曲，皞皞焉！吾不知誰之子也，象帝之先，如是而庶幾太古之民歟！」⁷⁷他的生活充滿了慕古之情，而對於典籍與書畫的收藏，更是生活上的主要憑藉。孫作之所以如此沉迷於藏書，以至於逃難之時甚至獨載書籍而已，其來有自。其實，他的收藏生活乃啟蒙於他的父親，他回憶道：

余先君靜安公以好古博雅聞於當時，而尤甚愛古錢，遇所得，輟衣食求

74 （清）查繼佐，〈倪瓚〉，《罪惟錄列傳》，卷二十七。

75 （明）郎瑛，〈寫字誦經〉，《七脩類稿》，卷四十，頁490。

76 （元）倪瓚，周南老〈故元處士雲林先生墓誌銘〉，《倪雲林先生詩集》，附錄。

77 （明）孫作，〈太古軒記〉，《滄螺集》，補遺，頁2上。

之不倦，或時有憂色，玩弄嬉笑，輒至解顏。作以先君雅好，莫此之若，故雖出於童兒，見必思有以戲。嘗戒曰：「設有水火，他物棄之可也，惟書畫、古錢，決不可遺。」後先君沒三年，壬辰（至正十二年，1352）盜警，作以所藏竊負而逃，獲免於難。又四年兵起，復以所藏載之吳，於是書畫、古錢，稍有存者，余方自幸不廢先君之命。⁷⁸

由於家風如此，孫作為遵守父命，不但篤於藏書，對於書畫與古錢的收藏，也不敢稍有懈怠，以是其家典籍與書畫之藏，雖歷戰亂而益發光大，真可謂孝子賢孫之流亞。諸如此類，在明初的江南五府地區還頗不乏其例，華亭藏書家邵文博，也是如此。其家典籍與書畫的收藏，源自其曾祖父，三傳至邵文博之手，歷經元末世亂而不衰。其家藏書之處名為「拱翠堂」，據〈拱翠堂記〉載：

華亭之大澤東西周五十里曰泖。環泖而居者多巨族，其能通經好古，則有翠巖邵先生焉！先生當宋季時，嘗薦於有司，代革勢殊，遂不仕，家卒。先生之孫南仲，號浦雲處士者，闢室所居之東偏，顏曰：「拱翠」，以示其尊也。處士沒四年，其子文博復治地東野，揭舊扁於堂，凡先生所藏經史子集及古琴、鼎彝、法書名畫，列度其中。登降出入，恆若先生之存，而一笑一談接乎耳目也。⁷⁹

由上可知，明初的江南五府地區，許多藏書家之所以兼收書畫，與其家傳的收藏風氣有關。藉由父祖之命，他們不但妥善庋藏家中舊有的典籍與書畫，並且以將其發揚光大為自任。所以，在家風的影響之下，使得江南五府地區藏書家們兼收書畫的風氣更加得以擅場，成為此間藏書家的收藏特色。

正統年間，有華亭藏書家徐觀，善書法，工詞翰，復以舉人貢入國子監讀書，才名益著，甚至交南、朝鮮諸國使者來華，也以購得其書法作品為榮。後選授武選司主事，於公務之暇，則賦詩濡翰，時以縑素求者旁午。告歸以後，日以潔養為事，乃「益購文籍、法書名畫及鼎彝古器，自娛而已。」⁸⁰徐觀藏書頗富，不但自娛而已，又不吝借人閱讀以助其學。如同縣有朱應祥者，「生有異稟，同邑徐主事觀家多藏書，應祥盡借讀之，於是學益富。」⁸¹稍後又有無錫藏

78 （明）孫作，〈錢譜序〉，《滄螺集》，卷六，頁9上一下。

79 （明）貝瓊，〈拱翠堂記〉，《清江貝先生集》，卷四。

80 （清）宋如林等，《嘉慶·松江府志·古今人傳三》，卷五十一。

81 （清）宋如林等，《嘉慶·松江府志·古今人傳四》，卷五十二，頁7上。

書家楊謨（1448-1475），收藏之好亦類徐觀。他「資富而務學，居囂而習隱，既冠有室，猶劬書無倦充其志，蓋將以詩自名。時諸閭右方孜孜營利，奢麗同流，君獨退然布素，惟博購古書史圖畫，庋閣一堂，日坐其中，披誦如諸生。」⁸² 同時還有嘉善藏書家姚綬（1423-1495），生平雅好藏書，據其〈家傳〉載：

穀庵（姚綬）起家進士，拜監察御史，事英皇帝，未幾罷歸，放情丘

壑，修辭染翰，人爭重之。積書萬卷，曰：「吾願以是遺子孫也。」⁸³

除了藏書以外，姚綬也喜歡收藏名人墨寶。他「平生慕張貞居（張雨，1277-1348）之為人，所見片紙隻字，無不收藏。」⁸⁴

（二）成化至嘉靖時期

成化、弘治年間，無錫藏書家張復（1434-1510），藏書之外，亦雅好收藏書畫。張復以醫為業，「平居莊敬自持，雖盛暑必冠服見客，客問則對，皆有理致，否則默默而已。家藏書畫最多，醫方倍焉！觀其志，即重貨不願易也。」⁸⁵ 同縣的藏書家華琨，「築尚古齋，實諸玩好其中。又多聚書，所製活板甚精密，每得祕書，不數日而印本出矣！」⁸⁶ 華琨不但以藏書與刻書名家見重於世，本身還有書畫收藏之癖。在其藏書之處「尚古齋」中，「凡冠履盤盂几榻，悉擬制古人。尤好法書名畫鼎彝之屬，每併金懸購，不厭而益勤。」⁸⁷ 又無錫藏書家邵寶，藏書處名「泉齋」，據其自己形容道：

精舍在無錫城東隅冉涇之上，即吾七世祖元處士容春府君舊居也，扁曰：「容春精舍」。未幾，別建於西門之□（原史料闕），扁曰：「二泉精舍」。中堂三間，仍扁曰：「容春」。前堂五間，中為廚二十，度古今書籍萬餘卷，扁曰：「泉齋」。⁸⁸

邵寶不但喜好藏書，對於法書揭帖的收藏也頗為留意。「自登第至侍養，一切餽遺例不苟受。篋無長物，惟圖書、金石遺文，畜之甚富。」⁸⁹

82 （明）邵寶，〈故楊秋林配陳氏墓前石表銘有序〉，《容春堂集》，卷六。

83 （明）姚惟芹，范言〈家傳〉，《東齋稿略》，附錄，頁5下。

84 （清）陳田，〈丙籤·姚綬〉，《明詩紀事》，卷十，頁527。

85 （明）邵寶，〈玉亭處士張公墓誌銘〉，《容春堂集》，卷七，頁21上一下。

86 （清）葉德輝，〈明華堅之世家〉，《書林清話》，卷八，頁10上。

87 （明）文徵明，〈華尚古小傳〉，《甫田集》，卷二十七，頁4下。

88 （清）葉昌熾，〈邵文莊寶〉，《藏書紀事詩》，卷二，頁90。

89 （明）鄧球，〈邵二泉先生謚文莊〉，《皇明泳化類編列傳》，卷四十四。

正德、嘉靖時期，無錫藏書家安國（1481-1534），以藏書與刻書聞名於世，「好蓄古圖書，鑄活字銅版印《顏魯公集》、徐堅《初學記》等書。」⁹⁰安國起家高貲，「富幾敵國。居膠山，因山治圃，植叢桂於後岡，延袤二里餘，因自號桂坡。好古書畫鼎彝，購異書。」⁹¹由於經濟條件的寬裕，安國在藏書、刻書與書畫的收藏上，都頗能自遂其意。同時還有華亭藏書家朱恩（1452-1536），也喜好收藏書畫。朱恩官至禮部尚書，上任不久即因事罷官，據其行狀載：

家居幾三十年，未嘗言及寵辱事，惟搜剔水石，樹藝果蔬。多蓄法書圖畫，俯仰遊戲，覽觀大化。……故易簣之日，惟存圖書數千卷，無他盈也。⁹²

烏程藏書家王濟（？-1540），「所居有長吟閣、寶峴樓，圖史鼎彝，奪目充棟。」⁹³除藏書之外，王濟也喜好收藏書畫，時「四方儒彥臨眺往來，觀其雕梁藻榻，錦衾繡茵，多上世所遺，益以法書名墨、朋從贈和之詞，閱之信宿，不可窮盡，意興悠然，非尋常可及。」⁹⁴所以，藏書之篤好加上書畫收藏之癖，使得王濟更加以博物崇古見重於世。上海藏書家陸深，家富載籍，編有《江東藏書目錄》，其自序云：

余家學時喜收書，然觚觚屑屑不能舉群有也。壯遊兩都，多見載籍，然限於力不能舉群聚也。間有殘本不售者，往往廉取之，故余之書多斷闕。闕少者，或手自補綴；多者，幸他日之偶完，而未可知也。正德戊辰（三年，1508）夏六月寓安福里，宿病新起，命僮出曝，既乃次第于寓樓，數年之積與一時長老朋舊所遺，歷歷在目，顧而樂焉。⁹⁵

觀其言，可知陸深藏書癖嗜之篤，其悠遊於書林當中的自在之情頗溢於言表。由於藏書生活可以如此自得其樂，使得他產生輕官好隱的情結。他曾上疏告訴皇帝說：「臣本農家，僻居江海之上，兼有藏書可資考索，衣食所餘，足備筆札之費。」⁹⁶陸深不但喜好典籍，對於書畫的收藏，也是以畢生精力投注於斯。他在

90 （清）葉德輝，〈明安國之世家〉，《書林清話》，卷八，頁11下。

91 （清）葉昌熾，〈安國民泰〉，《藏書紀事詩》，卷三，頁118。

92 （明）徐獻忠，〈禮部尚書朱公行狀〉，《長谷集》，卷十三，頁18下—19上。

93 （清）李衛等，〈浙江通志·文苑二〉，卷一百七十九，頁3126。

94 （明）焦竑，劉麟〈廣西橫州判官王君濟墓志銘〉，《國朝獻徵錄》，卷一百零一，頁117下—118上。

95 （明）陸深，〈附江東藏書目錄小序〉，《儼山外集》，卷二十八。

96 （明）陸深，〈進同異錄序〉，《儼山外集》，卷二十八，頁2上。

京任職於翰林院時，曾經因為擔憂從此將無暇整治管理其家所藏書畫而導致散佚，便寫信敦促其子說：「書畫是我一生精力所收，俱各散漫，不曾收拾，不知汝有暇清理否？」⁹⁷可見陸深對於書畫之好，當不亞於書籍。

無錫藏書家華夏（1490-1563），也是正德、嘉靖時期在江南地區頗負盛名的藏書家，而其所交遊，也皆為一時的風流文士。除了典籍以外，他對於法書名畫、碑刻搨帖以及器物鼎彝等古董的愛好亦不下於典籍。其藏書處名「真賞齋」，當中對於各種文獻與藝術品的收藏在質與量上都相當可觀，據其摯友蘇州藏書家文徵明（1470-1559）的描述云：

真賞齋者，吾友華中甫氏（華夏）藏圖書之室也。中甫端靖喜學，尤喜古法書、圖畫、古今石刻及鼎彝器物。……法書之珍，有鍾太傅〈薦季直表〉、王右軍〈袁生帖〉、虞永興〈汝南公主墓銘起草〉、王方慶〈通天進帖〉、顏魯公〈劉中使帖〉、徐季海〈絹書道經〉，皆魏、晉、唐賢劇蹟，宋、元以下不論也。金石有周穆王〈壇山古刻〉、蔡中郎〈石經殘本〉、〈淳化帖〉。初刻〈定武蘭亭〉，下至〈黃庭〉、〈樂毅〉、〈洛神〉、〈東方畫贊〉諸刻，則其次也。圖畫器物，抑又次焉，然皆不下百數。於戲！富矣！⁹⁸

可見華夏藏品內容之廣泛，數量之豐富，若以當時世人的眼光來看，確可目為「博雅」之流。（圖4）仁和藏書家郎瑛，除了收藏典籍以外，對於書畫以及其他文物也收藏頗富。「家故餘財，自奉親外，一以購書，所藏經籍、諸子史、文章、雜家言甚盛，至他人所無奇記逸篇、古圖畫、金石之刻，寢以益富。」⁹⁹

（三）隆慶與萬曆時期

隆慶、萬曆時期，上海藏書家董宜陽也喜歡收藏一些古代的石刻名帖。上海董氏藏書起自董宜陽的祖父，歷三世而傳至董宜陽之手，藏書之名於當時越發顯耀。其家藏書處名「西齋」，歷經祖、父二人，「咸嗜學修文，購古書籍至千餘卷。生子宜陽，幼聰慧不凡，兩世居家號清白，乏贏金緡錢之遺，每指西齋謂

⁹⁷ （明）陸深，〈京中家書二十四首〉，《儼山集·續集》，卷九十九，頁9下。

⁹⁸ （明）郁逢慶，〈真賞齋銘〉，《書畫題跋記》，卷五，頁1上-2上。有關華夏生平及其書畫收藏，可參見蔡淑芳，〈華夏真賞齋收藏與《真賞齋帖》研究〉。

⁹⁹ （明）張萱，〈畸人·郎瑛〉，《西園聞見錄》，卷二十二，頁34下。

曰：『業在是矣！』二公既卒，董子非獨能守其業，又能盡讀其書，搜奇括秘，所藏倍其先人。」¹⁰⁰ 董宜陽在中國古代藏書家庭的觀念裡頭，確為不敗家風的孝子賢孫之典型，「家故罄懸，迺其藏書餘五車，悉架之樓上，日環書讀之。」¹⁰¹ 除了書籍以外，董宜陽還喜歡蒐集碑帖，「生平嗜好惟書史、古石刻名帖，日坐一室，手丹鉛，校勘至丙夜不休。」¹⁰² 華亭藏書家何良俊，「家多藏書，於書無所不窺，尤雅意本朝。」¹⁰³ 每當「遇有異書，必厚貲購之，撤衣食為費，雖饑凍不顧也。每巡行田陌，必挾策以隨。或如廁，亦必手一編。所藏書四萬卷，涉獵殆遍。」¹⁰⁴ 因此，何良俊藏書之名不逕而走，而他也因為本身藏書之富而感到自豪，甚至因此對自己在官場上的不遇而開始輕視宦途，他曾慨然嘆道：

吾有「清森閣」在海上，藏書四萬卷，名畫百籤，古法帖、鼎彝數十種，棄此不居，而僕僕牛馬走乎！遂移疾歸。¹⁰⁵

所以，除了藏書以外，名畫、法帖、鼎彝等文物也都是他喜愛的收藏對象，並且充斥在他的藏書樓裡。

何良俊的好友朱大韶，也是華亭縣境頗具知名度的大藏書家。他是嘉靖二十六年（1547）進士，宦途不利，雖曾仕至南京國子司業，罷官後家居竟然長達三十年之久。方其致仕時，「歸構樓於城東北隅，置圖史，朝夕觀覽，左右遠眺自適，取名：『快閣』。」¹⁰⁶ 朱大韶「性好藏書，尤愛宋時鏤版。訪得吳門舊姓，有宋槧袁宏《後漢紀》，係陸放翁、劉須溪、謝疊山三君手評，飾以古錦玉籤，遂以一美婢易之，蓋非此不能得也。婢臨行題詩於壁，大韶見詩，為惋惜者久之。」¹⁰⁷ 雖說在宦途上頗感失意，但是朱大韶在藏書生活上的自得卻顯得令人稱羨。據《雲間志略》所載：

公晨起即科頭，坐「快閣」上，用五色筆批點古書數葉，侍兒進清茶一甌，點心一二品，即下樓梳洗。梳洗畢，進早膳，小菜亦多佳味，所盛

100 （明）皇甫汈，〈董氏西齋藏書記〉，《皇甫司勳集》，卷四十九。

101 （明）朱察卿，〈捉鼠記〉，《朱邦憲集》，卷六，頁15上。

102 （明）王兆雲，〈董子元〉，《皇明詞林人物考》，卷十一。

103 （明）何良俊，〈初刻本序〉，《四友齋叢說》，書前，頁7。

104 （明）何良俊，〈初刻本序〉，《四友齋叢說》，書前，頁5。

105 （清）王鴻緒等，〈何良俊〉，《明史稿列傳》，卷一百三十六，頁18下-19上。

106 （明）焦竑，王弘，〈南司業朱文石公大韶行狀〉，《國朝獻徵錄》，卷七十四，頁31上。

107 （清）潘介祉，〈明詩人小傳稿〉，卷六，頁213。

碟皆宣窯、成化窯。膳畢，始出「燕超堂」見賓客，凡四方遊士挾薦牘而來，及以古玩綺幣諸物求售者，公一一應之，各厭所欲而去。至午，中飯後即把翫古彝鼎，展名畫法書，或臨帖，或賦詩，或書扇，或遊覽後園，視兒童澆花灌竹，如是者率以為常。至下午，則設席款客，盛陳犀玉酒具于筵前，令家樂演戲登場，艷舞嬌歌，無所不備。雖性不能飲，而喜人飲，流連徹夜，終不見其倦色情容也。¹⁰⁸

書畫、彝鼎，以及一些古玩、綺幣等諸物的收藏，也是在朱大韶感到自得其樂的藏書生活當中不可或缺的主體之一。無錫藏書家秦柱，好藏書，「儲書甚富。」¹⁰⁹除了藏書以外，「素無它好，特好客，又好古金石圖史及法書名蹟，購藏百千卷，手自朱墨校讐者半，至搜獵稗官野史、逸壁斷戟諸種種，令侍史繕寫摩削者半，筆楮饗飧之費，傾其貲不鄙。」¹¹⁰

秀水藏書家項元汴，也以收藏品豐富見稱，「所藏多圖書、鼎彝。」¹¹¹「家固饒資，幾與陶白方駕，出其緒餘以購法書名畫，牙籤之富，埒於清閨。」¹¹²同縣的藏書家沈啓原，素以高貲雄於鄉里，所「藏經籍甚富，有《存石草堂書目》十卷。」¹¹³沈啓原雖出身富豪之家，然生「性儉素，服御食飲不事華腆。酷嗜墳籍，若古法書名畫及先代金石之遺，不惜重資畢購之，日事披閱，以此忘老。」¹¹⁴沈啓原的這個嗜好一直延續到其子沈自邠、孫沈鳳，以及曾孫沈大詹，累世收藏除了典籍八萬餘卷以外，還包含了「金石、繪事、秘玩種種。」¹¹⁵沈氏四代收藏，足稱秀水縣的收藏大家。餘杭藏書家徐桂（？-1605），所「居杭城東隅，有亭池竹木之勝，亭中列圖史、金石遺文與彝鼎諸法書名畫，日婆娑其中」，¹¹⁶也是兼好收藏書畫及其他文物的藏書家。一如徐桂，長興藏書家姚紹科，也好兼收書畫，「嘗構白雲齋、凌雲閣，購漢唐以來敦彝、圖史、書畫實其

108 （明）何三畏，〈朱司成文石公傳〉，《雲間志略》，卷十五，頁18上一下。

109 （清）葉昌熾，〈秦柱汝立〉，《藏書紀事詩》，卷三，頁117。

110 （明）吳中行，〈徵仕郎中書舍人餘山秦君墓志銘〉，《賜餘堂集》，卷十二。

111 同註64。

112 同註65。

113 （清）許瑤光等，〈光緒·嘉興府志·秀水列傳〉，卷五十二。

114 （明）陸可教，〈明故中憲大夫陝西按察司副使寬川沈公墓誌銘〉，《陸學士先生遺稿》，卷十二。

115 （明）李日華，〈味水軒日記〉，卷一，頁40。

116 （清）李衛等，〈浙江通志·文苑一〉，卷一百七十八，頁3105。

中，三吳名士，¹¹⁷過從踵相接。」¹¹⁸

仁和藏書家高濂，篤好藏書，「嘗築山滿樓於跨虹橋，收藏古今書籍。」¹¹⁹「高氏藏書甚多」，¹²⁰「交游湖海，咨訪道術，多綜霞編雲笈，秘典禁方。家世藏書，資其淹博，雖中郎至賞，束皙通微，殆無以過。」¹²¹除了藏書以外，高濂對於書畫的收藏也頗為用心。杭州藏書家馮夢禎曾於萬曆二十三年（1595）二月初七日起赴高濂齋中觀賞書畫，當日情形據其描述：

同方次卿諸君高深甫（高濂）齋中閱諸古玩，惟郭恕先臨王右丞〈網川圖〉，馬和之〈魯頌〉、〈商頌〉二卷最佳。初到登高閣眺群山積雪，遂見此物，尤可快也。後閱諸帖，有泉州舊本閣帖最佳，深甫以為閣本非也。諸窯器亦多有佳者。留飲至昏黑而別。¹²²

二十七年（1599）正月十二日，馮夢禎又與高濂相約賞鑑書畫，馮夢禎再述當日情形：

赴高深甫之約，再見〈開皇蘭亭〉，成國家物品，在諸本之上，與趙魏國臨本偽蹟同卷，深甫云以三十金得之。又黃庭亦佳本，後一、二十行乃別本綴上者。¹²³

可見高濂齋中所藏，除了典籍之外，也不乏貴重的書畫等古董。又如華亭藏書家宋懋澄，為萬曆年間松江府內最負盛名的藏書家之一，收藏品除了典籍以外，「尤多祕本及名人手鈔、舊搨碑刻」，¹²⁴也是喜好兼收書畫的著名藏書家。武進藏書家江惟清，也有收藏書畫的癖好，「家藏書至萬卷，嗜法書名畫。」¹²⁵

（四）天啓與崇禎時期

天啓、崇禎時期，江南五府地區藏書家喜好兼收書畫的風氣未曾稍減。秀水

117 一般而言，三吳為東吳、中吳與西吳之總稱。而東吳指蘇州、中吳指潤州、西吳指湖州。

118 （清）宗源瀚等，《同治·湖州府志·文學二》，卷七十五。

119 （清）丁中，《高瑞南》，《武林藏書錄》，卷中，頁45。

120 （清）葉昌熾，《高濂深父》，《藏書紀事詩》，卷三，頁134。

121 （明）高濂，屠隆《遵生八牋序》，《遵生八牋校注》，書前，頁6。

122 （明）馮夢禎，《乙未》，《快雪堂集》，卷五十三，頁4上-下。

123 （明）馮夢禎，《己亥》，《快雪堂集》，卷五十七，頁1下-2上。

124 （清）應寶時等，《雜記三·遺事》，《同治·上海縣志》，卷三二。

125 同註66。

藏書家汪繼美（？-約1626），¹²⁶「性喜披覽傳記，遇異書精刻輒厚直購之，與古名賢書畫奇蹟，雜置滿樓。風雨閒暇，即登樓，手撫卷帙，咿哦自快。」¹²⁷江陰藏書家李如一，「好書獨專，甚至減先人產收羅圖籍，而不惜其他，性情志氣，無非愛惜之。」¹²⁸因此，其家得以「藏書萬卷。」¹²⁹而藏書以外，李如一對於法書與碑刻的收藏也頗為熱衷，「凡諸懸之國門、藏之名山者，靡不殫力羅致。即鄉邦文獻與夫古刻法書、斷碑遺碣，有一字繫先代者，皆搜羅恐後至。」¹³⁰嘉興藏書家周履靖，「廢箸千金度古今典籍，編茆引流，雜植梅竹，讀書其中，自號梅癩居士。」¹³¹他的篤好藏書，頗為時人所讚賞，稱道：

隱君周逸之氏（周履靖）博雅好書，少時嘗廢箸千金業，羅四方書讀之，顧多務奇僻，得斷縑殘簡于塵土間，率覩縷手記，即隆冬溽暑弗輟也。中歲好益篤，家殖日落，里中有貧雅相姍咲，而四方好事者頗載書過之，君益自喜，愈奮搜奇索隱，百舍重繭不息。久之，蓄彌富。¹³²

周履靖癖好收藏，書籍以外，斷縑殘簡也是他的收藏對象。此外，他對書畫及其他的文物古器也都有所偏好，「日坐一小閣中，惟焚香跏趺，左右圖書及古蹟數十卷、秦漢鼎彝、晉梁隱君子像而已。」¹³³

周履靖姪女之子，也是同縣的著名藏書家李日華，他的藏書癖好是從高舉進士之後才開始的，自謂：「不佞自幸得一第以後，繆有嗜書之癖。」¹³⁴藏書之外，他也喜好書畫的收藏，我們可由他的《味水軒日記》當中眾多有關他收藏書畫的紀錄得到佐證，今舉其二，如：

余杭門生高淑陶從漢中回，貽余秦涼葡萄脯、皖歸酢、川椒、陝拓右軍〈聖教序〉、懷素〈草書千文〉、顏清臣〈爭坐位帖〉、歐陽率更〈多寶塔〉、顏書〈千福寺碑〉，皆佳。¹³⁵

126 鄭銀淑，《項元汴之書畫收藏與藝術》，頁58。

127 （明）李日華，〈汪愛荊居士傳〉，《恬致堂集》，卷二十五，頁18下—19上。

128 （明）李鶚，〈江陰李氏得月樓書目摘錄〉，書後，頁13下。

129 （清）錢謙益，〈李貫之先生存餘稿序〉，《牧齋有學集》，卷十八，頁785。

130 （明）李詡，李成之〈李成之重刻漫筆跋〉，《戒庵老人漫筆》，卷尾，頁357。

131 （明）李培等，《萬曆·秀水縣志·隱逸》，卷六，頁35上。

132 （明）周履靖，黃漢憲〈夷門廣牘敘〉，《明刊本夷門廣牘》，卷一，頁14上一下。

133 （明）李日華、鄭琰，〈梅墟先生別錄有序〉，《梅墟先生別錄》，卷上。

134 （明）李日華，〈答年家俞企延茂才〉，《恬致堂集》，卷三十二，頁44上。

135 （明）李日華，《味水軒日記》，卷三，頁173-174。

又如：

客以戴文進仿夏圭小景一軸，宋板《李翰林分類詩》十本，初拓《真賞齋帖》一部，質錢去。¹³⁶

這個「客」若非某位收藏家或其子孫，便是書賈。而在這一次的交易當中，他所賣給李日華的物品，不但有宋板書，也包含了法書與名畫，可見李日華在藏書之餘，也兼收書畫。

華亭藏書家董其昌，「性清敏，好汲引。家藏古圖籍甚備」，¹³⁷除典籍外，還包括許多書畫。他甚至還有貯藏書畫的專用船，在書畫船上進行水上行旅、鑑賞、創作書畫，航程上至北京，下至南方諸省。¹³⁸董其昌所藏書畫很多，不料最後竟然全燬於鄉民的抗爭之火，也就是明末轟動一時的「民抄董宦」事件。時人嘆曰：

聞董太史（董其昌）有回祿之變，緣與青矜及居民有小忿，因致結黨肆毒。所藏書畫，盡為灰燼，亦奇禍也。¹³⁹

同縣的藏書家陳繼儒，是董其昌的同學兼摯友，兩人過從甚密。陳繼儒非常喜好藏書，是當時赫赫有名的大藏書家。李日華說：

陳先生（陳繼儒）披韋帶索，自放草澤，方將糠粃天地芻狗萬象，一切世榮物尚排蕩殆盡，而獨留嗜書之癖，以故畸流英衲所與往來，得一隱書，必以歸先生；先生耳目所逮與手所羅致，必獲而後已，於是先生之笈日滿，而四方稱多異書者，必曰：「眉公先生」（陳繼儒）云。¹⁴⁰

一如董其昌，陳繼儒也頗具書畫收藏之癖。嘗自謂：「予寡嗜，顧性獨嗜法書、名畫及三代秦漢彝器瑗璧之屬，以為極樂國在是。然得之於目而貯之心，每或廢寢食；不去思，則又翻成清淨苦海矣！」¹⁴¹書畫與古器物，也是陳繼儒夢寐以求的收藏品。嘉善藏書家孫終和，也篤好收藏書畫。嘗以「目不窺古今之全書，私心憾之。乃檢諸家，購諸市，經史百家若干卷，墨跡名畫稱是，度而鑰之。」¹⁴²

136 （明）李日華，《味水軒日記》，卷三，頁171。

137 （清）查繼佐，〈董其昌〉，《罪惟錄列傳》，卷十八，頁2342。

138 傅申，〈董其昌書畫船—水上行旅與鑑賞、創作關係研究〉，頁205-297。

139 （明）袁中道，《游居柿錄》，卷十一，頁258。

140 （明）李日華，〈陳眉公先生續秘笈序〉，《恬致堂集》，卷十一，頁21下—22上。

141 同註45。

142 （明）支如玉，〈題孫終和藏書記〉，《半衲庵筆語》，文集卷三，頁18下—19上。

孫終和的收藏態度，認為典籍與法書名畫是同等重要的。

秀水藏書家曹溶（1613-1685），「家多藏書，愛才若渴，四方之士，倚爲風雅宗主。」¹⁴³ 藏書之外，也喜好收藏法書名畫。他曾利用李自成攻陷北京的明亡之際，大舉收購由內府流散而出的大批法書名畫。他說：「甲申（崇禎十七年，1644）三月，余留京師。內府所藏名蹟，爲人捆載而棄於道路者充塞街巷。予遣人羅致，日夕縱觀，別其妍醜而第其甲乙。」¹⁴⁴

四、結 語

明代江南五府地區的藏書家之所以兼好收藏法書名畫，實際上主要是起因於明代文士階層的生活品味、家族因素，以及藏書家本身的癖好等因素的影響。至於喜好收藏書畫的藏書家其例亦頗多，自明初至明末，主要有倪瓚、孫作、邵文博、徐觀、楊謨、姚綬、張復、華理、邵寶、安國、朱恩、王濟、陸深、華夏、郎瑛、董宜陽、何良俊、朱大韶、秦柱、項元汴、沈啓原、沈自邠、沈鳳、沈大詹、徐桂、姚紹科、高濂、宋懋澄、江惟清、汪繼美、李如一、周履靖、李日華、董其昌、陳繼儒、孫終和、曹溶等三十七位，當然，實際上的人數絕對不止如此而已。不過，我們仍然可從上述諸多的例證當中，對於有關明代江南五府地區藏書家兼收書畫風氣的興盛程度，得到確切的認知，並有助於瞭解藏書家與收藏家，有時是相結合的，很難區別其間的差異。

¹⁴³ （清）徐世昌，〈曹先生溶〉，《清儒學案小傳》，卷四。

¹⁴⁴ （明）郁逢慶，汪森〈序〉，《書畫題跋記》，書前，頁1下。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元)倪瓚，《倪雲林先生詩集》，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23冊，1997。
- (元)楊維禎，《東維子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21冊，1986。
- (明)支如玉，《半衲庵筆語》，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明崇禎間刻本。
- (明)文徵明，《甫田集》，臺北：世界書局，景印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第419冊，1988。
- (明)王兆雲，《皇明詞林人物考》，臺北：明文書局，明代傳記叢刊，第17冊，1991。
- (明)丘濬，《瓊臺詩文會稿》，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叢書集成三編，第39冊，1997。
- (明)朱察卿，《朱邦憲集》，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145冊，1997。
- (明)朱謀塹，《續書史會要》，臺北：明文書局，明代傳記叢刊，第73冊，1991。
- (明)何三畏，《雲間志略》，臺北：明文書局，明代傳記叢刊，第147冊，1991。
- (明)何良俊，《四友齋叢說》，北京：中華書局，元明史料筆記叢刊，1997。
- (明)何良俊，《何翰林集》，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142冊，1997。
- (明)吳中行，《賜餘堂集》，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157冊，1997。
- (明)李日華，《恬致堂集》，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明代藝術家集彙刊續集，1971。
- (明)李日華，《味水軒日記》，上海：遠東出版社，宋明清小品文集輯注二輯，1996。
- (明)李日華、鄭琰，《梅墟先生別錄》，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85冊，1996。
- (明)李日華、鄭琰，《梅墟別錄》，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夷門廣牘，1990。
- (明)李培等，《萬曆·秀水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中國方志叢書，華中第57冊，1970。
- (明)李詡，《戒庵老人漫筆》，北京：中華書局，元明史料筆記叢刊，1997。
- (明)李鶚翀，《江陰李氏得月樓書目摘錄》，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明代書目題跋叢刊，1994。
- (明)汪顯節，《繪林題識》，臺北：明文書局，明代傳記叢刊，第73冊，1991。
- (明)貝瓊，《清江貝先生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初編，集部第81冊，1965。

- (明)周履靖,《梅顛稿選》,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187冊,1997。
- (明)周履靖,《明刊本夷門廣牘》,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宋元明善本叢書十種,1969。
- (明)祁承火業,《澹生堂藏書約》,臺北:興中書局,知不足齋叢書,第2冊,1964。
- (明)邵寶,《容春堂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58冊,1983。
- (明)姜紹書,《無聲詩史》,臺北:明文書局,明代傳記叢刊,第72冊,1991。
- (明)姚惟芹,《東齋稿略》,臺北:中央研究院藏明嘉靖三十六年嘉興姚氏家刊本。
- (明)姚翼,《玩畫齋雜著編》,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188冊,1997。
- (明)皇甫汈,《皇甫司勳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75冊,1983。
- (明)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臺北:世界書局,讀書劄記叢刊二集,第12冊,1980。
- (明)郎瑛,《七脩類稿》,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名家導讀筆記叢書,1998。
- (明)郁逢慶,《書畫題跋記》,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16冊,1983。
- (明)唐錦,《龍江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1334冊,2002。
- (明)夏言,《夏桂洲先生文集》,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75冊,1997。
- (明)孫作,《滄螺集》,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叢書集成續編,集部第137冊,1989。
- (明)徐獻忠,《長谷集》,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86冊,1997。
- (明)袁中道,《游居柿錄》,上海:遠東出版社,宋明清小品文集輯注二輯,1996。
- (明)高濂,《遵生八牋校注》,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94。
- (明)張岱,《陶庵夢憶》,上海:古籍出版社,明清小品叢刊,2001。
- (明)張萱,《西園聞見錄》,臺北:明文書局,明代傳記叢刊,第116冊,1991。
- (明)陳繼儒,《妮古錄》,臺北:新興書局,筆記小說大觀十四編4冊,1976。
- (明)陳繼儒,《岩棲幽事》,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118冊,1995。

- (明) 陸可教,《陸學士先生遺稿》,北京:北京出版社,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160冊,2000。
- (明) 陸深,《儼山外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85冊,1983。
- (明) 陸深,《陸文裕公行遠集》,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59冊,1997。
- (明) 陸深,《儼山集·續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68冊,1983。
- (明) 陸深,《玉堂漫筆摘抄》,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明刊本紀錄彙編,第42冊,1969。
- (明) 陸樹聲,《陸學士題跋》,臺北:中央研究院藏明萬曆間刊本。
- (明) 焦竑,《國朝獻徵錄》,臺北:臺灣學生書局,中國史學叢書六輯,1984。
- (明) 項元汴,《蕉窗九錄》,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118冊,1995。
- (明) 馮夢禎,《快雪堂集》,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164冊,1997。
- (明) 楊守陳,《楊文懿公文集》,北京:北京出版社,四庫未收書輯刊五輯17冊,1997。
- (明) 趙用賢,《松石齋集》,北京:北京出版社,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41冊,2000。
- (明) 鄧元錫,《皇明書列傳》,臺北:明文書局,明代傳記叢刊,第73冊,1991。
- (明) 鄧球,《皇明泳化類編列傳》,臺北:明文書局,明代傳記叢刊,第80冊,1991。
- (清) 丁申,《武林藏書錄》,臺北:世界書局,中國目錄學名著一集6冊,1980。
- (清) 王鴻緒等,《明史稿列傳》,臺北:明文書局,明代傳記叢刊,第97冊,1991。
- (清) 吳其貞,《書畫記》,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0。
- (清) 宋如林等,《嘉慶·松江府志》,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史部第688冊,1997。
- (清) 李桓,《國朝耆獻類徵初編》,臺北:明文書局,清代傳記叢刊,第189冊,1985。
- (清) 李衛等,《浙江通志》,上海:商務印書館,1934。
- (清) 宗源瀚等,《同治·湖州府志》,臺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中國方志叢書,華中第54冊,1970。
- (清) 姚際恆,《好古堂家藏書畫記》,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姚際恆著作集,第6冊,1994。

- (清)查繼佐,《罪惟錄列傳》,臺北:明文書局,明代傳記叢刊,第86冊,1991。
- (清)徐世昌,《清儒學案小傳》,臺北:明文書局,清代傳記叢刊,第5冊,1985。
- (清)徐泌,《明畫錄》,臺北:明文書局,明代傳記叢刊,第72冊,1991。
- (清)張廷玉等,《新校本明史》,臺北:鼎文書局,中國學術類編,1998。
- (清)許瑤光等,《光緒·嘉興府志》,臺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中國方志叢書,華中第53冊,1970。
- (清)陳田,《明詩紀事》,臺北:明文書局,明代傳記叢刊,第14冊,1991。
- (清)葉昌熾,《藏書紀事詩》,臺北:世界書局,中國目錄學名著一集6冊,1980。
- (清)葉德輝,《書林清話》,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73。
- (清)董似穀等,《光緒·武進陽湖縣志》,臺北:臺灣學生書局,新修方志叢刊,江蘇第5冊,1968。
- (清)潘介祉,《明詩人小傳稿》,臺北:國家圖書館,1986。
- (清)錢謙益,《牧齋有學集》,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國古典文學叢書,2003。
- (清)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臺北:世界書局,中國文學名著三集23冊,1985。
- (清)應寶時等,《同治·上海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中國方志叢書,華中第169冊,1975。

二、近代論著

- 毛文芳,〈花、美女、癖人與遊舫——晚明文人之美感境界與美感經營〉,《中國學術年刊》,19期,1998年3月,頁381-416。
- 王子舟,〈隋唐五代酷嗜書畫的私家藏書風氣〉,《資訊傳播與圖書館學》,7卷2期,2000年12月,頁45-48。
- 吳承學等,〈晚明心態與晚明習氣〉,《文學遺產》,1997年6期,頁65-75。
- 吳智和,〈明代蘇州社區鄉土生活史舉隅——以文人集團為例〉,收於東吳大學歷史系編《方志學與社區鄉土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8,頁23-47。
- 沈振輝,〈元明時期的收藏學〉,《中國典籍與文化》,1999年1期,頁55-61。
- 沈振輝,〈明人的收藏活動〉,《文博》,1998年1期,頁87-90;55。
- 沈振輝,〈明代藏品市場略論〉,《文博》,1998年6期,頁83-86。
- 金炫廷,《明人的鑑賞生活——江南文人的鑑賞活動與鑑賞自娛》,臺北:私立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4。

孫克強，〈論「雅」〉，《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1991年6期，頁87-92。

傅申，〈董其昌書畫船——水上行旅與鑑賞、創作關係研究〉，《美術史研究集刊》，15期，2000年，頁205-297。

傅璇琮等，《中國藏書通史》，寧波：寧波出版社，2001。

單國強，〈明代書畫鑒藏概說〉，《文物天地》，1994年3期，頁37-39。

黃桂蘭，〈晚明文士風尚〉，《東南學報》，15期，1992年12月，頁139-158。

廖可斌，《明代文學復古運動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暴鴻昌，〈明清時代書齋文化散論〉，《齊魯學刊》，1992年2期，頁98-102。

蔡淑芳，《華夏真賞齋收藏與《真賞齋帖》研究》，臺北：私立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

鄭銀淑，《項元汴之書畫收藏與藝術》，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4。

羅筠筠，〈明人審美風尚概觀〉，《明史研究》，4輯，1994年12月，頁167-1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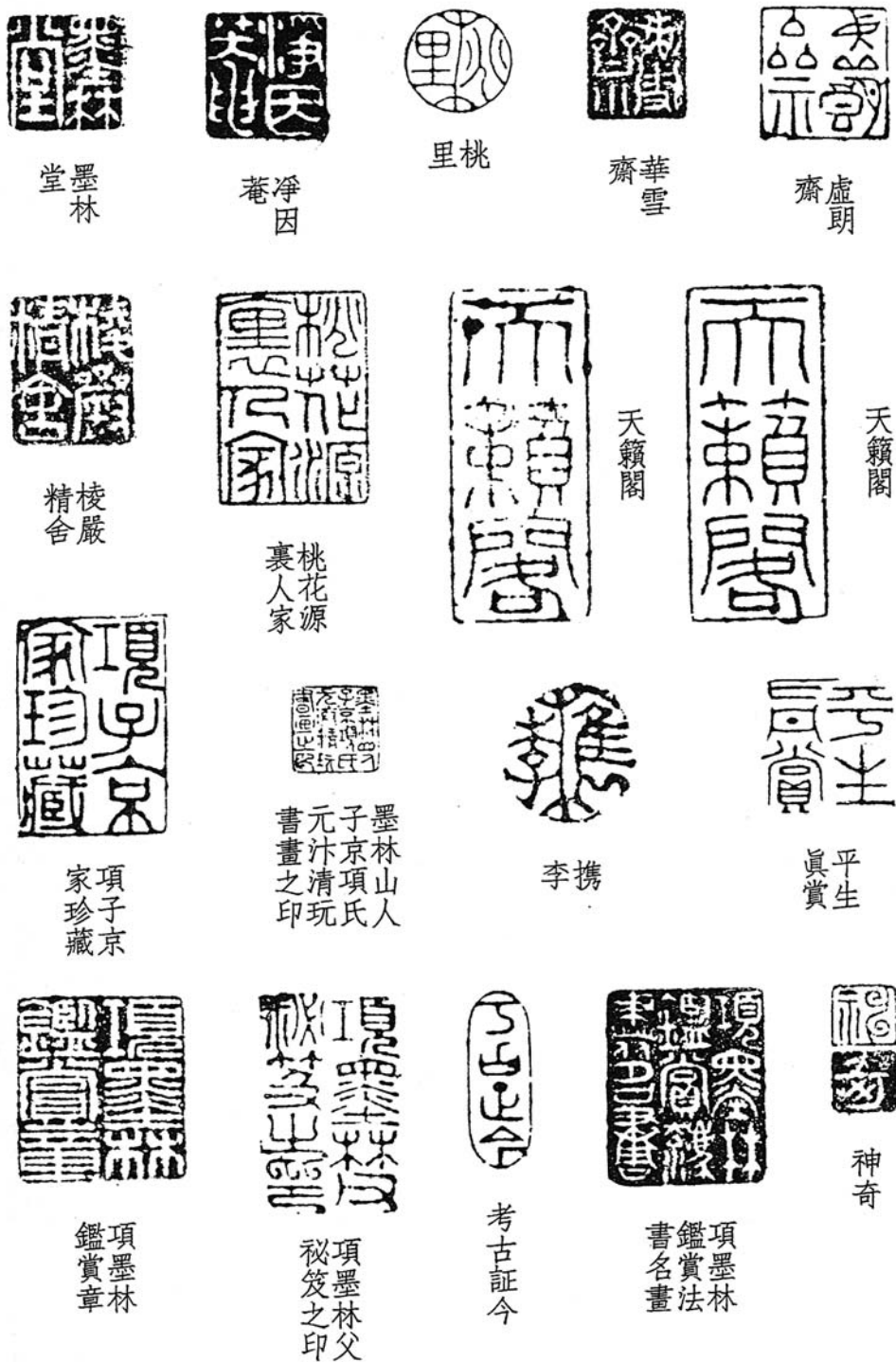


圖1 項元汴在所藏書畫上，常鈐以多方收藏印，圖中所見即為其中之部分。摘自《晉唐以來書畫家鑑藏家款印譜》第二冊（香港：藝文出版社，1964）。



圖2 董其昌是晚明重要書畫收藏家，也是重要書畫家。董源〈龍宿郊民〉即曾為他所收藏，現藏國立故宮博物院。



圖3 元人〈張雨題倪瓚像〉 國立故宮博物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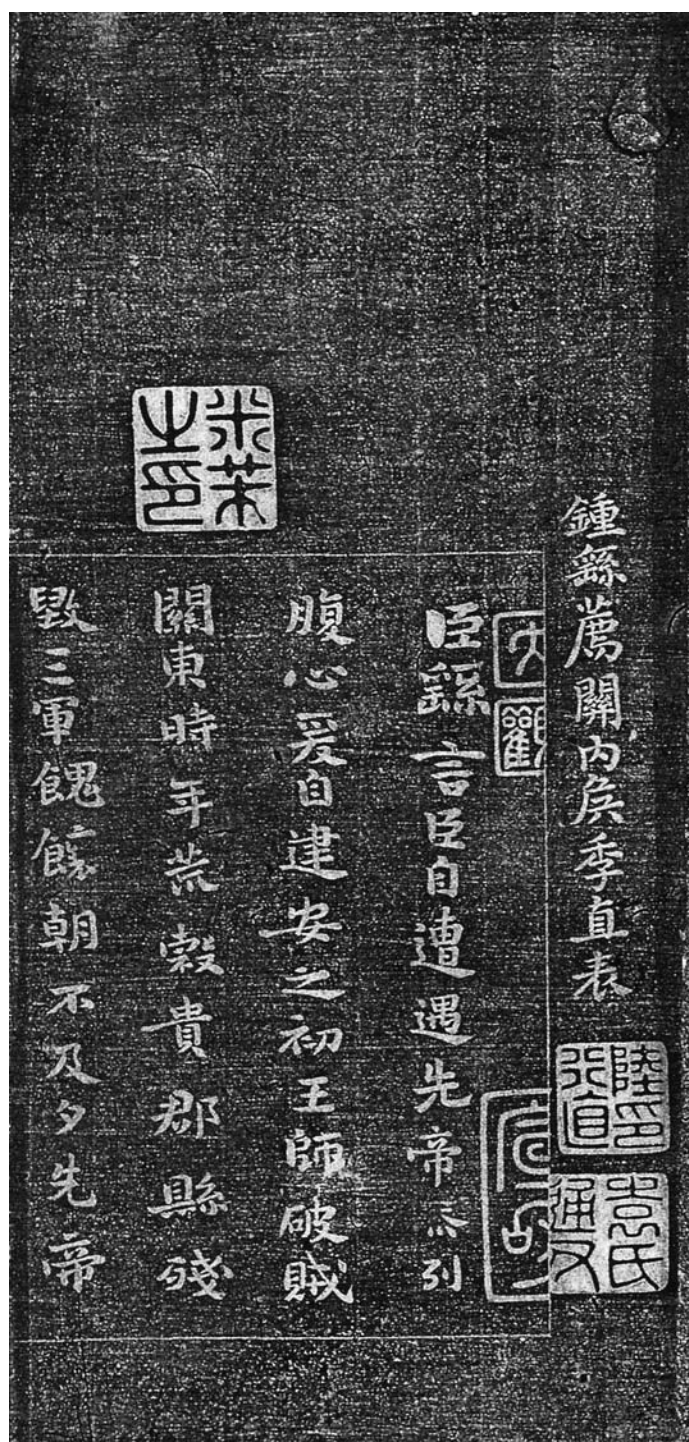


圖4 華夏收藏之書蹟刻爲《真賞齋帖》，包括鍾繇〈薦季直表〉等名蹟。